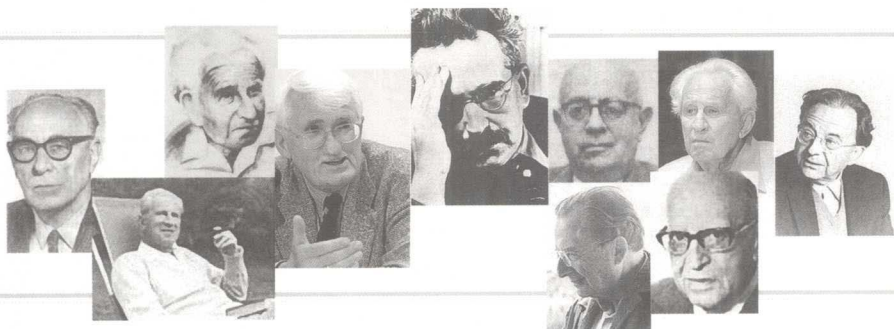




#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下册)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 著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法兰克福学派： 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下册)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 著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 (德) 魏格豪斯 (Wiggershaus, R.) 著；孟登迎、赵文、刘凯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书名原文：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SBN 978-7-208-09225-9

I. ①法… II. ①魏… ②孟… ③赵… ④刘…  
III. ①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IV. ①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5018 号

责任编辑 石楠  
封面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  
[德] 罗尔夫·魏格豪斯 著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62  
插页 4  
字数 777,000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25-9/C · 359  
定价 98.00 元

# 目 录

[下]

## 第六章 重建社会里的批判性装饰..... 573

参与战后重建——对于西德公众政治意识的研究..... 573

霍克海默——一夜之间的功成名就..... 586

阿多诺关于批判的经验社会研究的构想——研究所的危机——马

尔库塞的梦想..... 595

研究所的稳固——返回法兰克福后最先出版的两本书：《社会

学》(Sociologica)、《组群实验》..... 614

告别独立自主：对曼内斯曼公司的研究——阿多诺退出经验

研究..... 630

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爱欲与文明》..... 649

## 第七章 处于争论中的批判理论..... 671

作为独立的跨学科研究者——走向偶然音乐，以及其他领域中的相

应方法..... 671

文学笔记..... 685

通向一种无需担心缺乏基础的哲学..... 699

于尔根·哈贝马斯——研究所最后一位社会理论家，受阿多诺赏

识却被霍克海默认为太左..... 708

实证主义争论..... 742

保守主义争论..... 761

海德格尔批判..... 772

## 第八章 剧变时代的批判理论..... 789

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延续：《否定的辩证法》..... 789

批判理论家和学生运动..... 804

|                               |     |
|-------------------------------|-----|
| 哈贝马斯走向社会交往理论—阿多诺遗著《美学理论》..... | 835 |
|-------------------------------|-----|

|         |     |
|---------|-----|
| 后记..... | 863 |
|---------|-----|

|           |     |
|-----------|-----|
| 参考文献..... | 868 |
|-----------|-----|

|                |     |
|----------------|-----|
| 档案和征引文献目录..... | 868 |
|----------------|-----|

|              |     |
|--------------|-----|
| I. 档案: ..... | 869 |
|--------------|-----|

社会研究所在各类小册子、备忘录、报告和信函中的

|          |     |
|----------|-----|
| 计划书..... | 869 |
|----------|-----|

|         |     |
|---------|-----|
| 文件..... | 870 |
|---------|-----|

|         |     |
|---------|-----|
| 通信..... | 871 |
|---------|-----|

|                |     |
|----------------|-----|
| 社会研究所研究报告..... | 872 |
|----------------|-----|

|                                                     |     |
|-----------------------------------------------------|-----|
| II. 研究所出版物, 研究所最重要的合作者的出版作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版物..... | 875 |
|-----------------------------------------------------|-----|

|                |     |
|----------------|-----|
| III. 二手材料..... | 915 |
|----------------|-----|

|                                |     |
|--------------------------------|-----|
| IV. 有关背景的著作以及构成背景的组成部分的著作..... | 924 |
|--------------------------------|-----|

|         |     |
|---------|-----|
| 索引..... | 941 |
|---------|-----|

|          |     |
|----------|-----|
| 译后记..... | 980 |
|----------|-----|

### 参与战后重建——对于西德公众政治意识的研究

当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和他们的夫人在法兰克福安顿下来，并且开始扩展“德国前哨阵地”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看作是犹太人、左派知识分子和批判社会学家，身处于一种差不多已经完全清除了他们这种人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种环境中的所有的迹象一直以来都明确地指向对旧秩序的恢复。德国—犹太人文化所显现的那种独特的共生性(symbiosis)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摧毁了。除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外，法兰克福大学全盛时期——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非常有名的讲师和教授中，没有一位重返法兰克福。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之所以怀着耐心和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被迎接，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几个特殊的例外。

与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他是极少数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之一——不同，<sup>[1]</sup>阿多诺不是在劳工运动或反对派，而是在统治权力本身当中寻求支持。正如霍克海默在写给黑森州的总理格奥尔格—奥古斯特·齐恩(Georg-August Zinn)的感谢信当中所说的，他们在寻找“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那类时常只能在理论上徒然地盼望，依然追求纯正教育之实践目标的朋友”。<sup>[2]</sup>

霍克海默在其教授职位恢复之后，不久就被选为哲学系主任，从

1950 年秋到 1951 年秋，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在这个职位上，他对法兰克福大学的重建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他与神学的关系在侧重点上已经有了变化。他不但为重新建立起来的新教和天主教神学保证了教授席位，随后也为犹太教研究提供了一个教授席位。

432 这再一次显示了霍克海默在交际和组织方面的才能。这个研究机构，一度被认为不能专心于他们真正应该干的工作而早已被人们所遗弃，现在却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吸收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一次又一次地保持了他们的活力，使他们的严肃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为了赢得经费和官方的补助，霍克海默甚至准备强调这个机构对于战后重建的参与。在一封他写给那些有可能赞助的人的便笺中，他把这个研究机构赞美为：不但能提供先进的社会学研究路线，能将“德国社会哲学和人文学科传统的扩展”与“现代美国社会学提供的最先进的经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而且是为国家紧迫问题提供学术建议的中心。<sup>[3]</sup>

对于研究所新近历史和研究计划的这些陈述，旨在向预期的赞助者提供信息，包括如下一些评论：

社会研究在各个方面，尤其在研究社会结构和研究生产过程里面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等领域，以及在舆论研究和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方面，最近几十年里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由于政治上的事件，德国还不能在人们渴望达到的程度上参与这项研究。如果说其他工业国家的经验还能为德国提供一些可供遵照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些学科对德国公共生活和对德国经济合理化所起的作用，怎么高估也不算过分。

社会分析可以解释战后的许多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难民问题。它们能为城市和工业区的重建提供重要的认知基础。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可以帮助年轻人更深入地理解在我们自己的人民当中以及各民族之间出现的关系紧张，并因此可以帮助他们为克服这些困难提出独立自主的见解……

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社会研究可以为各种新职业

开辟道路。这些新方法对于科学家的训练要求，并不亚于对工程师、化学家或医生的要求，对于它们的评价也不应该比其他这些职业低。不仅有政府行政部门和所有形成观念的传媒，诸如新闻出版、电影和广播等，而且有商业部门也都在支持着很多的社会研究团体。社会研究可以在他们的工厂中创造出最佳的社会状态，可以预先确定和计算出公众对他们的商业部门有什么需求，还可以监控和改善他们广告的影响力。人们在德国也可以期待类似的发展过程。<sup>[4]</sup>

1950年夏天，《法兰克福新报》(*Frankfurter Neue Zeitung*)在霍克海默的合作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社会学进行反对偏见的斗争：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HICOG)支持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sup>[5]</sup>文章声明社会研究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教育和知识领域(像研究所对偏见的研究)，更希望有可能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了让工人们可以获得最高的生产力，应该在何地、以何种方式恰当地建立一个工厂”。

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欺骗？是不是霍克海默为了通过异常危险的违禁交易来筹资，就对研究所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现代化理性重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明显的吹捧？难道他真的想要把研究所变成一个由政府和企业资助的、可以在重建过程中充当矫正角色的机构吗？难道，它是一个事业问题，就像稍后的学生运动被描述的那样，是一次“经由制度的长征”？或者，是研究所的领导人在自欺欺人？他们想把研究所变成一种将重建(reconstruction)转变为复兴(restoration)的工具吗？或者，由于研究所要求超越专断主义(principle of self-assertion)以及个人的、集体的利己主义，要求建立更人道的社会环境，它只能用那些听起来比别人陈旧的贺辞更少空洞感的语词来粉饰自己罢了？由于研究所得仰赖于财政赞助，为了维持它的存在，这会不会成为他们更加谨慎地去进行研究的理由，而不是依照他们的学者气质和学术才能所必需的那样去做，会不会不给批判理论家提供支持？

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显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真诚的和公开的讨论。谁会在这里讨论呢？返回法兰克福的人是研究所的残部：只有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按说现在已经实现了原来的目标：摆脱重负。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之间是一种日常化和共生的关系，使得他们的讨论绝不可能唤起对所谓的习惯策略的质疑，或者对那些有关他们自身行为之意义和目标的思想——后者已经退化为纯粹的客套话——的置疑。

霍克海默没有认识到，一个在财政上不再独立的研究所迟早会被迫承担研究合同，而在此情况下他就重建了研究所。同样，他也没有注意到，批判理论家在恢复时期很难不陷入道德上的困境。研究所不能期望从费利克斯·韦尔那里再得到金钱上的资助。他的生意早已不兴隆了，再说他已经留在了美国。在这里所能做的选择，难道就是那位被批判理论家们看不上眼的拉萨斯菲尔德采用的策略，即利用研究合同，甚至是令人讨厌的合同，为研究所提供完成其自身计划的机会？同时，它又不能为了自身的计划而引发太大的混乱，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研究合同不被批准。

在新研究所成立的最初阶段，有一件事是富有象征意味的。彼得·冯·哈塞尔贝格 1933 年之前曾是阿多诺的学生，1950 年后与研究所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为阿多诺和油漆制造商霍伊彻斯特（Hoechst）公司的生产经理安排了一次会面。哈塞尔贝格设法让生产经理对研究所的工作产生兴趣，但是阿多诺却给这个人上了一堂有关研究所工作方法和目标的课，最终使此人确信：这样的研究所对霍伊彻斯特公司没有任何作用。在这里，阿多诺显示出他在“管理社会研究”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的能力缺欠，就像他以前在做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时那样。但是哈塞尔贝格并不想就此放弃。他转而去求助霍克海默。霍克海默的意见是：我不适宜做工业社会学的研究；难道我们现在也应该支持它？在这段时期，霍克海默一方面以一个批判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试图让研究所的工作合乎商业和行政部门的口味。他也许认为，在建立新研究所期间，这依然是一种可靠的伪装形式，但似乎没有必要把这种事看

得太过认真。

就建立研究所这一点来说，霍克海默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社会研究所 1950 年春天的备忘录中包含一个五年预算，其中 50000 美元留作建筑新研究所和置办新装备的费用，109800 美元作为每年的运转费用。（年薪从搬运工和秘书的 1000 美元到研究所领导，如霍克海默本人的 7000 美元不等。）研究所仍然有临时的住所，一部分利用已被炸为废墟的旧研究所建筑，一部分利用法兰克福大学评议会的几间办公室。1950 年，有一位叫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的美国高级特派员，把 200000 德国马克交给研究所自由支配，还给了 235000 马克作为重建费用。这种强有力的支持源于那些负责美国对德政策的人的信仰——社会学，尤其是美国公民所描述的那种强调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因素。（1949 年在达姆施塔特 [Darmstadt] 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 [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也得到了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财政资助，但它只坚持了没几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明斯特大学资助建立了多特蒙德社会学研究机构 [Sozialforschungsstelle Dortmund]。美国人对政治科学的赞助甚至超过了对社会学的支持。)

法兰克福市政府希望用旧研究所的位置来扩充法兰克福大学，就将紧邻大学的另一处地方换给了研究所。他们支付给社会研究协会 100000 马克的弥补差价，并且清理了新地点上的废墟。在霍克海默的请求下，法兰克福大学也为研究所的重建捐助了其余的 55000 马克。1950 年 10 月底，这些资金全部被集中起来。除了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和法兰克福市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以外，社会研究协会和某些私人捐赠者也提供了资金。建筑工程在 11 月之前破土动工。

435

霍克海默通过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社会学机构设在同一座大楼内，差不多成功地完成了重建社会研究所的工作。虽然当时还无法确定他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但他请求市政府允许将这座大楼增高到四层。这个要求很容易地被批准了，他们希望这个城市将会以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机构而自豪。附加的第四层楼最终建起来了，但

联合国的那个机构却设在了科隆，并在那儿持续了7年（从1951到1958年）。

由于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资助，研究所以以在1950年夏天开始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对西德人政治意识的研究。研究结果后来结成《组群实验》（*Gruppenexperiment*）一书出版。<sup>[6]</sup>这个舆论研究项目旨在调查德国人对外国、对占领德国的军事力量、对（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及其所犯罪行带来的连带责任问题、民主问题和德国在全世界的地位等问题的态度。这种舆论研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选择，不仅因为舆论研究是一种美国进口货，在西德引起了强烈的兴趣，还因为民主教育一直是美国对德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研究所可以将1949—1950年出版的《偏见研究》（*Studies in Prejudice*）展现为他们的代表性成果。它将自身看作是半美国化的研究机构，而且，最初研究的大部分资金就来自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

忠诚于老研究所的学术传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那种浮泛的意见统计并不感兴趣。就像他们在《权威主义人格》中所指出的，他们试图穿透和超越观念的表面，并最终识别出民众当中存在的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的潜能。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研究意味着什么，他们又该怎样进行呢？在伯克利大学的反犹太主义研究当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运用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的方法。通过间接的和反射的方法可以显示性格结构，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揭示人们对具体政治话题的态度时，就不可行了。在实际上没有讨论这些主题的情况下，无法揭示人们对于具体话题的看法。因此，必须要达到的是，被测试的人应该公开表达他们对于此类具体话题的意见。

提出最终将这种研究方法用于研究计划，是一种富有霍克海默特色的想法。甚至在反犹主义的研究计划期间，摄影研究计划也是最合他心意的部分，因为它是一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没有太多脱离的研究手段，因此可以真正洞察那些对参与研究实验的人起作用的社会机制。现在霍克海默提议采用一种不同于平常的、更现实的提问方式，以人们处在列车车厢中的情形为模型，来研究德国人对待政治话题的态

436

度。在车厢中，讨论常常是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展开的，他们甚至以令人惊异的开放性来讨论那些最微妙的话题。这种模型在此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共同经受的苦楚或对于痛苦的共同记忆会使大家比平时更快地联系起来。

对于霍克海默来说，定出一个由公众舆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组成的目录，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他肯定看到过马克·艾布拉姆斯 (Mark Abrams) 讨论团体访谈之利弊的文章，此文发表在 1949 年的《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上。艾布拉姆斯是受商业资助的伦敦舆论研究所的主管，他采用这种还不合常规的办法来考查广告活动。他指出，组群访谈的优点之一，是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受访者不适应正规提问方式的前意识 (pre-conscious) 观念就会显露出来；组群的气氛引导受访者表达他们感觉偏狭的、并因此会在正规访谈中压抑的思想和情感；组群访谈中表达的东西呈现在一种可认识的语境中；日常生活特有的矛盾观点并置现象，在组群访谈中再次出现了；组群中的成员趋向表达与个人会谈中的“私人”观点不同的“公共”观点，而后者更容易为他们的实际行为提供证明；而且，在一群有相近意向的人，甚至在同一组群当中，受访者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会比在正规的访谈情境中少一些谨慎和防御。艾布拉姆斯把这些看作是分析数据时最重要的问题。对他来说，只要关注的不是各种不同意见的累积，而是各种态度构成的结构和动力，那么这一问题就似乎不成其为严重的障碍——组群只能困难地依照随机抽样或比例抽样原则建立起来。甚至连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在研究他们的病人时，也没有注意到从普遍的人群当中进行随机抽样的问题，不过他们还是发展出了一套解释人心灵的普遍理论。

无论艾布拉姆斯的文章是否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计划观念产生过影响，它为那些对定性分析感兴趣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原创性的和新颖的观念。霍克海默一如既往地这类新奇思想持开放态度。有关组群动力学的话题自 1940 年代以来显著增加，而且他对此非常熟悉；至少，他可以通过他的同事、流亡者库尔特·黎文的研究

熟知这一点，他在纽约反犹主义研究期间曾把库尔特·黎文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研究所 1944 年研究劳动时采用的参与性访谈的方法，就是一个典范，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日常情境中的讨论引向那些还没有被注意到的特定话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他们在这一领域获得的印象、经验和想法中，推导出组群讨论的程序，作为一种新修正、新发展的“现实的舆论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所自身的计划。根据 1952 年新建的研究所准备的第一份章程，组群讨论的程序就是从“问卷调查、心理投射技术和组群访谈”当中发展起来的。（研究所的同仁们喜欢用“组群讨论”（group discussion），而不喜欢用在英语世界当中用得更普遍的“组群访谈”（group interview）一词，是为了明确，这不是对一群个体同时进行面试的问题，而是确认能从组群讨论的框架中引发出什么意见的问题。）

法兰克福的同仁们最早在德国使用的这种程序，在 1950 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它大体上是按如下步骤进行的。大约十个参加者组成的一群人聚集在人们通常愿意聚集的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针对某个话题讨论大约两个小时。为了保持匿名性，如果有必要，可以给参加者一些写有假名的卡片。还可以为引发讨论提供一些“基本刺激”（basic stimulus）。（在研究所的组群研究中，可以播放一封虚构的公开信的录音，这封信是由一位在联军队伍中服役五年之后的士兵写给当地报纸的。“基本刺激”以与研究《权威主义人格》的问卷调查表相同的方式汇集起来，它依据的不但是人们说出的直接经验或常识，而且还有诸如种族优越感、忏悔情结和权威情结等分析范畴。）做现场调查的研究者配有一台录音机，并配有一名助手记录未被磁带录下的所有反应或事件，而研究者则发挥着中立主持人的作用，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讨论能尽可能自由地展开并引发自然而然的陈述。在讨论的第二部分，现场调查者会根据具体情境，介绍关于讨论话题的某个具体领域的定型化的论点和反论点。通过填充一张简短的调查问卷表，提供出基本的统计信息。

在测试阶段，所用的基本刺激会改变数次——人们认为可以提供心

理刺激,但不能提供过度刺激。经验的收集围绕如何避免组群构成中的错误、最有效地使讨论进行而展开。我们知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同事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例如,他们当中最为投入的蒂德利希·奥斯默尔(Diedrich Osmer),他是研究所一个部门的领导,接受过正规的训练,达到了学士学位的同等要求。而且,他除了在研究所工作以外,还到一家钢琴商店兼职。还有一位来自弗莱堡的学心理学的学生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有一天途经法兰克福的时候,停留下来参观了研究所,随后就去贯彻实践课的一部分内容——1951年在研究所攻读心理学学位。因此,这项计划同时体现了在经验社会学研究方面对新一代社会学家进行的实实在在的训练。这代表了社会研究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刚开始时的特点。

1950至1951年冬天,研究所开始在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及奥格斯堡等城市的市区和乡村中开展初步调查研究,调查德国人政治意识的一些重要方面。在人群自发聚集和相互谈话的地方——小酒吧侧房、旅店、难民营、大工厂的食堂、燃料库、俱乐部会所,大约有1,8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通常以8—16人为一组群,在一块儿讨论那位联军士兵的公开信中所提到的各种政治话题。在这项计划的调查阶段,有20多个研究助手以及新闻界的速记员参与,后者负责将那些从录音带记录下的内容打出来。而分析阶段要处理由1,635个参加者所进行的总共121组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要处理多达6,392页的讨论抄本,其中包括人们在组群讨论中谈到的话,以及讨论主持人和助手的评述。

在实践中,霍克海默所说的那种诱人的列车车厢模型存在的误导性,不久就变得显著起来。由于这些组群是任意组合的,成员之间完全不认识,在职业、兴趣和生活阅历等方面没有丝毫共通的地方,因此通常无法为讨论创造一种自由的气氛。对于121个讨论组群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法兰克福组群——其组成方式类似于艾布拉姆斯在他的文章中所提议的那样——利用了预先设定的(pre-structured)、在社会学或意识形态方面相对比较同质的多个组群。比如,他们集合起来的人群,要么来自同一村庄的农民,要么是一个俱乐部中彼此认识的成员,不然就不

过是一群有着相同职业、相同政治信念或相同生活阅历的陌生人(比如像年轻的教师、青年社会主义者或逃亡者),而讨论的气氛很快就显现出类似于那些熟识好久的人们期盼的情形。

439 霍克海默的列车车厢模型,在他五年之后出版的成果中被说成一个对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灵感的概念,显示出一个在分析材料过程当中也明显存在的问题。霍克海默的模型假定,吸收公共舆论而形成的支配个体的思想以及个体对公共舆论的态度,将会在易于沟通的组群气氛当中全部呈现出来。尽管此处采用的手段不同于柏克利研究中的方法,但关键的思想还是要让自我稽查的机制失效。但是,在预先设定的组群中进行的、研究进而要仔细考察的各种讨论当中,会出现一种明显的情形,即,组群讨论越容易产生支配性意见,就越能证明有必要去分析组群的动力学和个体的性格结构。即便舆论在个体参与者心灵状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充分说明,即使能产生有效的意见表达的真正交流环境得到了充分说明,组群动力学和个体的性格结构也绝不是那么容易能得到解释的。

组群访谈后四到五周,会对参加过组群会面者当中四分之一的人进行单独访谈。这些接受访谈者不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在分析中也不用考虑他们。要对单个会面的结果和组群讨论中表达的意见作比较,也是不容易、不可能的,因为在讨论中会有大量的人保持沉默,还因为很少有发言者能对每个话题都发表他们的看法。平均看来,完全沉默的人超过了发言的人,构成了占61%的多数。另外,由于无法系统地记录每个组群的特性,也就无法对每个组群的动力学结构进行分析。

因此,从可用的材料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定性的证据,能说明个人意见的原动力是在组群条件下产生的。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满足于将这项研究仅仅看作是对西德人就某些具体政治话题发表的“民意”的研究?难道没有充足的理由将组群讨论程序看作培育微型集体气氛的方法,看作是对可以表达民意的情境的模仿?难道有理由将这项研究的目标看作是在揭示《权威主义人格》中描述为“文化气候”的东西——个体不是或多或少地受它感染,就是或多或少可以免除它;

揭示萨特在他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当中描述为“无形的、弥散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另外的社群；揭示阿多诺用黑格尔的术语“客观精神”所描述的东西？在进一步的分析阶段，阿多诺在为他的一名助手所写的研究草案当中，有如下的陈述：

我们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知识的供给而不是知识的要求。然而，它对知识存在于“大众传播”当中的制度形式并不感兴趣，而更关注人们在其社会存在中直接碰到的、更为模糊的但却无处不在的形式：他们呼吸的知识空气。因此，研究的关注点绝不是直接指向主观的意见，而是指向那些已经在客观上预先确立或指定的、在社会上广泛散播的意识因素；它明确指向“客观精神”，即“德意志意识形态”。<sup>[7]</sup>

440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满足于这类目标。通过组织组群讨论唤起的客观精神，即便与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与对客观因素的分析毫不相关，那么至少能为研究各个“活”人提供社会心理学依据。对他们来说，呈现“客观精神”而使它与任何客观因素无关，那么就意味着要放弃他们宣称的唯物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在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结构赋予了个性特征的个体当中制造某种抽象化的东西。

因此，调查和对于调查的分析都因持续缺乏明晰性而出现了缺陷。尽管首要的目标是通过组群讨论来确认客观精神，但每个说话者的态度构成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共同基础。这些态度并不被看作相关组群各个方面，而被看作由参与者构成的总体因素。除此之外，虽然考察了客观精神对个人精神状态所起的作用，但是，试图发展出一种可以如此进行考察的程序的种种努力，从未超越最初阶段而有所进展。而且，既然推进的目标是要为一种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的调查（曾经计划用这种方法拓宽柏克利的研究）准备基础，组群研究也就呈现为一种暂时性的和实验性的特征。

尽管有些助手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从一开始就有一点是确定无

疑的：他们获得的材料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涉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愿意接触的事情。用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范畴来加工手抄本，很像在 1930 年代后半期调查工人阶级时收集的那种材料，尽管在这两个课题之间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关联。在紧张进行的十个星期的集体工作当中，完成了一个对讨论手抄本进行编号的“记分手册”。在进行定量分析时，将所有的个人而不是讨论组群当作统计单位，并在独立于讨论组群的统计组群——比如以 20 到 30 岁的人，小学生或农民各为一组——的归类下加以比较。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定量分析人们对于民主的态度时设置了七个“测试话题”：对民主政治（波恩和战后德国的国家类型）的态度，对罪行（共同承担战争暴行和纳粹主义的责任）的态度，对犹太人的态度，对西方占领国（美国、英国、法国）的态度，对东部的态度，对重整军备的态度，对德国人自身的态度。

441 那些参与了讨论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在讨论中发言的人），无论对苏联还是对西方列强的态度都主要是否定性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发言者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矛盾态度。对于民主政治明确持反对意见的人是对民主无任何保留意见的人的两倍，甚至更多。同时，有一半的发言者拒绝为第三帝国的暴行分担任何的罪责。有两个统计组群——农民和大学师生（academics）——尤其凸显出他们的否定性态度。所有农民都无一例外地拒绝分担国家的罪责；大学师生事实上也一律拒绝这一点。在对犹太人问题发表见解的农民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证明具有激烈的或相当强烈的反犹倾向。而参与讨论的大学师生，尽管他们在参与其他话题的讨论时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但显然在回避有关犹太人的话题。事实上，对这一话题表达意见的人当中，有 90% 以上的人显示出激烈或相当强的反犹倾向。

整个数量统计的结果，并不能说广泛代表了西德民众的态度，而且，这一结果还受限于发表过意见的参与者。结果呈现的具体数字比例如下：（涉及东德问题之外的所有话题时）16% 的人持肯定态度，40% 的人持矛盾态度，44% 的人持否定态度。在谈到东部的话题时，持拒绝